

五月卅號

世界政治經濟情報

第八輯

1986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五六四三號

日本幕末之外交(上)

要目

- 日本幕末之外交史……………洪文彩譯
- 革新國策及國防與財政……………孟樹之譯
- 英日對華協助與太平洋問題……………H 譯
- 中日經濟提攜論……………K 譯
- 日本的對華國策……………中央東京社分社
- 中日關係再檢討……………大公報譯
- 再論中日關係……………S 譯
- 日應調整遠東外交……………K 譯

國立中央圖書館

日本幕末之外交

服部之總著
洪文彩譯

一 歐美列強

德川幕府的外患，是由十八世紀後半的「北邊」問題開始的，所以必須由俄羅斯開始敘述。但是日本問題，並非世界史上一個落伍了一世紀之久的原始蓄積國家的庫頁島，北海道，及千島羣島問題，而是新的產業資本主義時代市場的問題。為觀察走入了世界史的過程，不必追溯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前去。同時縱然是最落伍的國家，若沒有產業資本主義的世紀便不能展開牠的歷史。

英法是十八世紀以來的產業資本主義國家。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雖是資本主義的勝利，但至此為止，對英國商品的「大陸封鎖」，就是在中世紀的俄羅斯胎內，也植下了新產業資本主義的種子。歐洲——尤其英國以「穀倉」的地位的俄羅斯，在一八二二年，已經不得不為本國產業，而設定對外國商品之高度的保護關稅。在普魯士霸權之下實現的強力的「德意志關稅同盟」，終於在一八三一—三六年之間實現了。法國因一八三〇年的六月革命，推翻十五年間的反動政府，而恢復了資產階級的政權。依拿破倫戰爭而擴大了殖民地市場的英國，也以一八三二年的議會改革及一八四六年的穀物條例，戰勝了歐洲諸國壁壘森嚴的關稅，及國內地主貴族，確定了資產階級政治的勝利，近代的資本主義，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就逐漸支配了全歐洲。

歐洲在一八四八年，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恐怖，早已銘記在心。而且以德國為中心，北

由波蘭起，南至意大利之整個的資產階級革命，因資產階級本身受着威脅而流產了。一八四七年，馬克斯及恩格爾所發表的共產黨宣言，在空前未聞的政治反動，及經濟的好況內解體了；當時的五十年代，正是以國際市場戰為中心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鬭爭期（一八五三—五四年的俄土戰爭。一八五四—五六年的克里米戰爭。一八五九—六一年的法奧戰爭。）

由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實質的是五十年代——的中國開放，加里佛尼亞及澳洲的發現金礦，與急激的殖民，及日本的開國，相繼而來，把世界市場，大概（附注一）完成了。一方面獨立戰爭以後，英美第二次戰爭（一八一二—一五），隨之爆發，北部工業有了急速發見的合衆國，不得不隨着最初關於市場獲得戰爭（一八四六—七的美墨戰爭）及金礦發見，而呈現不可抗拒氣勢的國家。

（一）「市民社會的固有任務，至少要輪廓的造成世界市場，及在其基礎上的生產。因為世界是圓形的，所以才有加里佛尼亞及澳洲的殖民，中國及日本之開放的結局」（馬克斯恩格爾書簡集，一八五八年）。

六十年代，是自由競爭之發展的最高界限（附注一）。美國受一八五七—八年的恐慌影響，發生南北戰爭（一八六一—六五），在俄羅斯有農奴解放的發生（一八六一），無產階級結成了第一國際（一八六四）。另一方面在歐洲的資產階級完成了國民戰爭中最大而且最後的普法戰爭（一八七—七二），而產生了新德意志帝國與法國的社會主義共和制度（Paris Commune）。由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末期，已經是近代獨占資本之發生期，預告帝國主義時代對地面之最後的大分割，至此世紀的末葉，仍然進行（附注二）。

- (一) 列寧著「帝國主義論」，岩波文庫版三一頁。
(二) 同上 一一二頁。

若就以上所劃的時期，觀察列強的關係及其變化，可知十七世紀以來的英法開爭，由原始蓄積時代，移入確立資本主義時代之後，毫無改變。在這個新地盤之上，以十分堅固的根據繼續下去。英法以克里米戰爭為機會的五十年代的攜手，是出於英俄對立與拿破倫三世一時的現象。

英俄兩國，由十九世紀的初頭至三十年代為止，並沒有對立。穀物與近代商品的交換，使英國的產業資本與俄國的商業資本，緊密的結合起來，因小麥耕地和商業通路而發生的第一次俄土戰爭（一八二八—二九），以英法二國的支援而開幕了。至三十年代為止的英俄同盟，僅在一八〇七—一二年的期間，受了拿破倫一世的強迫而中斷。因本國工業的發達——尤其是與英國最衝突的紡績工業——而不能解放內地市場之「穀倉」的俄羅斯，一如從前為商業的通路，不得不從新的意義，因國外市場而發生戰爭。在英國，對印度市場的重要性，越發的增加了。阿富汗的英俄抗爭（一八三九），一時因俄方的讓步，雖然得到小康；但第二次的俄土戰爭（一八五三—四），即刻招出以英法為敵的克里米戰爭。

不過英俄對立十分明白的表現，是由六十年代開始。彼時俄國雖然一度與法國同盟（在一八五九年的德奧戰爭中），但在這個同盟中，並未樹立日後的經濟基礎。然而普魯士已經變成俄國穀物的大需求者，代替英國供給俄國對於機械等類之需求，也很可能。於是在一八六三年以後，以防備英國為目的德俄同盟就成立了，此同盟直至于十九世紀之末，被俄法

同盟代替爲止，仍然持續其同盟的關係。至一八六四年以後，因土耳其斯坦，塔什干方面的侵略，英俄關係，極度的緊張。關於對馬的英俄鬥爭，也是這個時候發生的事情。

拿破倫三世時代（一八五二—一八七〇）的法國對外政策，就是一個特徵。不斷的征戰（除歐洲以外，如大洋洲（一八五一—一八五二），中國（五六—六〇），印度（五八—六七），墨西哥（六二—六七），日本（六四—六九），朝鮮（六六）等）與不可測的離合政策，必須以一八四八年以來，利用了法國的階級均衡之絕對政權之秘密理解之，換句話說，就是爲抑制資產階級直接支配的要求起見，必須一面利用無產階級，一面迎合擴張領土的資產階級之心理。

北美合衆國在這個時代，暫守門羅主義（一八二三年）。不過爲了理解美國關於中國及日本問題之任務起見，不能忘掉一千八百二十年代以來，英美海上的猛烈競爭。至六十年代爲止的帆船及汽船的發達，雖說他是英美海上競爭的結果，也不算錯。

新德意志帝國及意大利的登場，是在七十年代以後。他方如荷蘭，葡萄牙，及西班牙，已經成了過去的國家。於是近代資本主義，使英法俄美四強國成爲七十年代的十九世紀歷史之選手而活躍。而且那個市場戰的主要舞台，在七十年代以前，最主要的，可以說是在太平洋沿岸。在八十年代以後，已經移到阿美利加，當年的中國及日本，一定是產業資本主義極盛時期的市場及殖民地政策的極好對象。

一一 中國市場

十六世紀以來把中國及日本捲入漩渦的世界商業，至十七世紀，就成了荷蘭，英，法三國合唱，取葡萄牙，西班牙而代之的時代了。英國自一六二四年以來，至德川幕府末葉，雖

由日本境內退出；但在中國的商業，完全依照世界史的順序，一步一步的占了主位。至十八世紀之末，英國東印度公司發賣的中國茶葉總額，爲二千萬磅，正當世紀初頭的四十倍。中國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以前，對於全世界的文明國家，雖然是獨占的茶葉供給者；但是他的獨占的介紹人，却是英國。新興的北美合衆國，却也同時在十九世紀，脫穎而出，成爲可怕的商敵。

美國帆船，以拿破倫戰爭之後二十年代的西印度（大西洋）貿易，對抗英國帆船，占了最初的勝利。在三十年代的對華貿易，也時常消擊了英船（附注一）。遠東自由貿易的洗禮，雖然是片面的，是在一八三四年舉行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廢止對華貿易獨占權），但其另一面的原因，就是有力的美國船之競爭。

（附注一）至一八三四年爲止，這十六年間的中國輸出貿易，由英國船輸出的，平均每年爲一六五七八三六七美圓，美國船每年平均爲六四五三二四九二美圓，廣東入港船舶的數目，英國每年平均爲五十六隻，美國爲三十七隻（Worse, H. B.,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hinese Empire*, Bd. i, p. 83）。當時英船對新興的美國船舶失敗的原因，是傳統的沿用舊造船術，換言之，就是因爲對於船長及船幅，不能縮短至傳統的比率以下，所以在速力上，無論如何，不能駕乎美國之上。在對華貿易，特別由於英國東印度公司船舶噸數的龐大（英國一千至一千三百噸，美國三四百噸）與特權制度的腐敗，形成一個極大的阻碍。

然而一八三四年以前的中國，雖然是茶絲及其他特產物的偉大輸出國；但供給近代市場

需要的商品，幾乎一無所有。由一八一八年至一八三三這十六年間的英國船的舶來品（一年平均輸入額爲六一六〇一九五美元），計有百分之六十的西班牙銀貨，百分之五的鴉片，百分之三十五的物產——野產人參，水銀，鉛，鐵，銅，銅，毛皮之類。合衆國北部的近代產業，在對華輸出上，沒有什麼反映。英國對於中國，在一八三四年以前，真如馬克斯所說，「一點棉製品也沒有輸出」（附注一）。至一八三三年爲止，這十六年間英國輸入總額（一年平均額爲一九〇二五六〇一美元）的百分之二十二，不是近代英國的武器——棉製品，而是供給中國手工業原料的印度棉花！鴉片占百分之三十四，受這種保護的貨幣，僅占百分之十一。就是僅占其餘的百分之四十二的「其他商品」，其半額以上的部分是亞細亞的物產，半額以下的（約占英國輸入全額百分之二十）是毛織品及其他的近代產業。

（附注一）馬克斯「中國印度論」日譯全集第六冊八四頁。

但就英國而論，對美國無關係的印度市場，與中國却很有關係。英國產業在把中國市場化以前，必須把印度首先市場化。這件事情，自十八世紀末葉以來，至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之間，就有急速的進展。十八世紀末葉以降的印度，即由東印度公司所代表的掠奪商業資本走入市場及農業殖民地（原料生產地）下另一階段。一八一八—一八三七年之間，由英向印度輸出的棉製品，增至五二〇〇倍，印度製造工業的舊中心——打次加地方的人口由十五萬減爲二萬。英國產業，至三十年代，即以中國市場，爲自己的對象。英國棉製品於一八三四年開始來到中國市場了，毛織品的數量，也增加了。

印度市場，一定要繼續開拓的。因此之故，印度本身，不論如何，對於英國製品的支付

手段，也要日益增加，不論何處，皆有準備的必要。由十六十七兩世紀西班牙人及荷蘭人學來以鴉片爲急性傳染病的良藥，在烟草裏邊混用鴉片的中國人，由十八世紀之末，開始吸食純粹的鴉片，雖有一八〇〇年的禁令，但仍以猛烈之勢，開始消費印度鴉片。前述一八一八—一三三年間英國對華輸出額中百分之二十的英國製品爲開拓中國市場的前衛，復以百分之八十的印度商品爲開拓印度市場的後衛。而且惟有鴉片才是以後擔負如此使命之印度商品的代表者。

一八三四年以後，鴉片及棉花，早有飛躍的成績。至一八三〇年爲止，貿易的決算，不論何時，都是有利於中國，由印度，英國，及合衆國繼續有銀輸入中國；但在三四年以後，因鴉片之故，而白銀由中國向印度流出，增加無已。鴉片戰爭（一八四〇—一四二）對於中國可以說是保全清朝的國家戰爭；對於英國是保全印度市場的戰爭。事實上關於鴉片戰爭的一切戰費，自然須由印度政府擔任，自三十年代開始，英國本國直接開拓中國市場，爲此大戰爭所課的使命，自不待言。就是南京條約（一八四二）以五口通商與廢止廣東方面的中國特許貿易組織，確認對等的國際關係，關稅協定及割讓香港，爲建設中國新市場的基礎。

一八三四年的印度棉花輸入額爲四四三二三八捆，三七年增爲六七七三五一捆。鴉片如下表（單位箱）：

通商及占領香港，不過得到商業由廣東移到上海的結果。其他的商業中心地，則毫無改變。此市場失敗的主要原因，實在因實際上的對華輸出貿易之增加，僅是依賴鴉片的交易。其次，就是要達到破壞中國原有經濟組織，並通過小農業等，需費很多的時日。」

他於是承認「亞細亞的生產形態」有牢不可破的抵抗力。英國的資產階級，在人眼所不能看到的抵抗之上，由五口通商的當時，感到血與火的抵抗了。具有大陸的和深度的規模攘夷運動，和清朝的不斷的內亂，就是這種抵抗。

但是我在這裏，不想討論馬克斯所說的太平天國之亂的原因爲「歐洲的干涉；以及在鴉片戰爭後，銀貨向外國流出，外國的商品破壞了經濟的均衡」。

中國的「秩序的行商」，對於英國產業是一個緊要的問題。到這「客商」終了之日爲止，英國不敢解決日本問題。鴉片戰爭以後一八五六年的亞羅號事件以後，英國又不得不對華使用砲火了。

不過至那年爲止，把世界市場由東方大致完成的事情，雖說是一種諷刺，但在「一八四八年以後，就由北美合衆國担任起這個責任了。」

一八五〇年正月，馬克斯以加里佛尼亞發見金礦（一八四八）爲「比二月革命還要重大的事實」，以爲：「使吾人認爲比亞美利加本身之發見，將要發生更大規模的結果」。我對於這個有興味的評論，雖因頁數的限制，不能將全文列出；但是他的論點，就是說加里佛尼亞的金礦，等於從前在渺無人煙的太平洋東岸，發現新文明國土一樣的重要。同時從前與歐洲遠隔的市場的亞細亞海岸，由巴拿馬與歐洲連結起來，因而世界的商業中心地，就移到「

倫敦，利物浦，舊金山，森周安，加格里斯及巴拿馬」，世界交通的重心，恐怕要由倫敦移到北美，「惟有彼時的太平洋，將演與今日的大西洋，及古代中世紀地中海所演的同樣任務，世界大水路交通的任務，同時大西洋將要降落到與今日的地中海相同的地位，僅僅具有內海的任務」。其結論為：「歐洲文明諸國，因將踏入今日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舊轍，為救濟其產業上，商業上及政治上之從屬狀態起見，惟一的機會，就在社會的改造。倘若如此，歐洲產業的優越，才可以確保，地理上狀態的損失，或者也可以填補了」。

在這裏我們不能考慮自四十九年間的歐洲反動的馬克斯之焦急，誤認了事態。太平洋上的一切市場——西至中國大陸，南至澳洲，東至北美西岸一帶——對於當年的資本主義有如何的意義，就當時最開拓的中國市場觀之，或者也可以明白了。而且達到此太平洋市場的道路，如果美洲西部沒有開拓，一定都要經過印度洋，對中國及日本，僅能由西方走入。即使插着星條旗（美國旗）的船，不問他是商船，軍艦，帆船，汽船，設若沒有很好的特別理由，則普通的航路，只有取道於印度洋。馬克斯在五十年初頭的預測，其實現不過遲至次年。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雖是由於巴拿馬的蘇伊士運河的鑿通（一八六九）；但這個問題的解答，一般是以美洲的地理的本身作為客觀的論據，這樣不能說是一個極大錯誤。目下使馬克斯預測的結果不能實現的，是英領澳洲金鑽的發見（一八五一），美國在英美大西洋汽船競爭中的失敗（一八五八），及其中的美國內亂（一八六一—六五）。而且更應舉出八十年代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分割，繼其後的帝國主義的出現，與前述的巴拿馬運河開鑿的遲延。不論那一個問題，都是立於亞洲市場與歐美資本主義相關聯的關係上，其中最可代表的一環，

在當年具體的各條件上，不過是巴拿馬「地理」上所表現的而已。

在那裏有一個大的倉皇狼狽，根據新事態，自覺美國之優越與其使命的，是美國自身，馬克斯雖以十分有理的理由，寫出「不數年恐怕就要見到汽船由英格蘭向加格里斯，由加格里斯及舊金山向西德尼，廣東，及新嘉坡，為定期的航行」；但是美國海軍委員會對於向政府提出的設定太平洋汽船航路建議書的報告，起首就說「舊金山的獲得，對於對華通商的交通，給與一個不可等閑視之的便利」，結尾並謂「由歐洲至中國有冒險性的往復道路，因經過合衆國，可以縮短五個月以內的航程，減少現在所用日數一半，尙有餘裕」。這個結論的錯誤，是在倫敦與中國，及紐約與中國之間帆船所用的日數，與由巴拿馬的聯絡，採用新設汽船航路時，倫敦至中國，及紐約至中國間所推定的日數一點。但同時這個報告所露出的真理，是表明當年美國汽船業要凌駕英國的狀態，及表明以此等新武器，一舉而奪取對華貿易的優勝的野心。惟有設定橫斷太平洋的汽船航路，才是獲得對華貿易的決定的勝利的第一條件。

現在有反觀當年美國在華勢力的必要。把前述一八六七年的數字，作為美國南北戰爭前的評價，甚不妥當，大約至一八五二年為止，美國船對在中國貿易中追擊英國船，是屢戰屢捷的。不獨在中國貿易中是這樣，即在大西洋貿易中，四十年代的帆船運送，也歸美國獨占（英國船舶，更於一八五〇年失去舊航海法的保證），在五十年代，英美更以汽船作激烈的競爭。在中國海的勝利，於一八五〇年很快的以加里佛尼亞—克里巴爾橫斷太平洋的航路，為暫時的決定了。五二年的數字，雖因英國方面迴航澳洲的帆船競爭而陷於衰落；但在上海

入港船舶總噸數百分之四十七，仍為美國所占有，英美在商船上的競爭，可說是半斤與八兩。關於輸出貿易，尤其關於茶的貿易，斷然是美國操了勝利。依橫斷太平洋汽船的新設，美國當年欲一舉而確保勝利的意氣，已有十分的根據了。

於橫斷太平洋汽船案的途中，美國單獨對付日本的問題出現了。美國與英國不同，她對中國情勢的不安，沒有十分關心的必要。第一個理由，因為美國對華貿易的優勢，殆與中國輸出部門有關，茶及其他輸出品，在一八五三年上海不安的時候（太平軍占領），輸出額尚且增大了。第二個理由，因為美國沒有像英國所有的印度市場，所以有若干任華的美國商人，縱然與印度鴉片的漏稅輸入有關，但美國本身確能對中國誓以誠意禁止輸入鴉片。

日本在中國內亂猖獗的一八五三—四年間，因為美國艦隊的空砲而開國了。

俄國也於加里佛尼亞歸屬於美國，再建遠東的經營，由北方覬覦日本及中國。

英國於一八五六年，在中國開始其武力的「秩序客商」。

英法第一次侵略華北（一八四七年—五七—五八）——天津條約

英法第二次侵略華北（五九—六〇）——北京條約

因英國的援助，討平了太平天國之亂（六〇—六三）

北京條約確認了天津條約，強迫要求天津開埠，割讓九龍半島。所以在鴉片戰爭以後的總決算，大概就是如天津條約所載。其主要者為北京設定公使館權及外國商民旅行內地權之獲得，楊子江沿岸各港之開埠，降低關稅（不論輸出輸入均值百抽五）及輸入鴉片的公認等等。

一八五七年中英宣戰，同時英國的宿敵俄羅斯，籠絡清廷，關於割讓烏蘇里及其他等地的交涉，完全成功了。

中國貿易，大約除去眼淚之外，毫無所有，中國絲的大需求者——法蘭西，與英國携手，決不是克里米亞的結果與正義。英國雖與法國携手，但又不得不懸念着對華的俄法同盟。事實上在歐洲的法俄秘密同盟，雖然是一時的，但在一八五九年成功了。英法在中國，雖然互相携手有了六十年之久，但在日本，不久就互爭起來了。

二 培爾里赴日以前

英國真正熱心於日本問題，是在一八六〇年以後，美國在五〇年的初頭，就能首先與日本問題發生關係的主要原因，正是因為太平洋。培爾里赴日以前的日本外交，可以分爲三期。

第一期是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以降的北邊問題，這個問題的實體，就是十七世紀以來的羅馬訥夫一家經營遠東殖民地。以列薩訥夫的對日交涉（一八〇四）爲頂點之原始蓄積國家的對日政策，不久就因歐洲問題而中斷了。幕府也不知道在何時忘掉命令全國驅逐俄艦的文化令（一八〇六），而於一八一四年以後解除北邊的守備。林子平及伊能忠敬所討論的北邊問題，引起對海外之關心與準備，同時開闢閉關論的對立雖已開火，但俄國本身，還不是產業資本主義時代的選手。自一八四七年以降，由穆拉威夫再建的俄國遠東經營，就不僅是原始蓄積國家的事項了。俄國那樣的對日交涉，走上了美國的前面。

第二期是文政驅逐令（一八二五）所標示的外交。這個驅逐令的對象，就是英國東印度

公司及艦隊。自一六二四年由平戶數次撤退以後，日夜圖謀恢復對日貿易而終歸失敗的英國，由十八世紀之末，對於比中國還低廉的絲茶供給者，及英國製造毛織物市場的日本，更加注意；企圖將一七九五—一八一五年的英國對法對荷蘭殖民地戰爭的舞台，移到長崎，來實行解決懸案。費爾頓艦的信號，雖時時的妨害幕府對英的情感，但文政驅逐令的直接動機，是在一八二二年以後，在近海發現的英國捕鯨船。我們似乎可以以這個時期，視為鴉片戰爭以前，一八三四年以前，英國在華發生主要作用的時期。

不過在中國貿易的當時，美國好像已有次於英國的勢力，在此時期中，以日本為目標的美國船之登場，實在不可忽視。受了法蘭西革命的餘波之美國船，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備船名義，出入長崎（一七九七—一八〇七），雖說是另一問題；但捕鯨船出動於日本近海，則駕凌英國而上之了。

茲暫以鴉片戰爭以後，至培爾里赴日止為第三期。恰在一八四二年發表的所謂天保新水令，突如緩和文政驅逐令，是顧及對岸中國事變的結果，漸漸走入本格的德川幕府末期外交史的領域。

此時期的問題，有關於三項事件的四個國家。就是荷蘭國王的開國忠告書，琉球開國及美國使節比德爾的初次的赴日。

英國就是在鴉片戰爭以後，也不能與中國分手；對日本也並未親善。自一八四五年（弘化二年）以來，任意測量長崎與江戶灣，和法國要在琉球互相角逐。

但是荷蘭擔負了對日本宣告新時代已經到來的任務。一八四四（弘化元年）年，她打破

問題，向駐長崎的俄使，微露親切之意。對方也要顧慮克里米戰爭，對境界問題，雖有適宜的處置，但在市場問題方面，以荷蘭為與國，並完全得到英美的同意。

安政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荷蘭駐長崎的商館長，以荷蘭領事的資格，提出追加條約的要求書，其大意為：先年日俄親善條約中第五約載有「在函館及下田，已允許俄人自由貿易」，荷蘭及英美三國人民，也欲依最惠國條款，在右列地點，請求允許自由貿易。

安政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一八五七·七·一六）調印的日荷追加條約，將正式自由貿易，為左列的規定（共四十條）。

在長崎函館兩港，允許通商（函館由調印後十個月起（第一條）

噸稅—每噸銀五錢（第二條以下）

「船數及買賣銀額，皆不規定一定的限度」，因此正德五年（一七一五）以後每年一艘的限制，就廢除了（第五條）

除商場交易外，完納百分之三十五的關稅，即承認直接交易（第六條）。但在商場辦理的數量，若有遲付價錢及替代物等，皆在同處賠償損失，萬一彼此相對辦理損失，商場不過問」（第七條）下略。

於是在翌年九月，與俄國以同樣追加條約的形式締結自由貿易的條約。全部二十八條，其大體與前述日荷追加條約略同。

貿易雖與調印同時被許可，但其內容則不得而知。最初英國的駐長崎領事郝基遜到遠長崎港時，依安政條約的通商，立刻就實現了；但等候日本貨物裝載的外國商船，達十五隻之多

恐怕英美法等國，也要依據親善條約中最惠國條款，均需俄國的利益吧！但俄國先取得的自由貿易，是不限制船數及商品額的自由貿易，保留特權的商場貿易，增高關稅稅率，承認日本的自主權。與美國以前取得的安政通商條約，在性質上有天淵之別。

五 通商條約

安政五年（一八五八）與各國締結的所謂安政條約，至明治二十七年締結「實施三十二年的改訂條約」為止，存續了四十年之久。安政條約是當年歐美資本主義規定半殖民地市場之日本的地位的，所以是日本資本主義發達途上的一大障礙，就後年必死的修改條約運動，及國權主義的實踐觀之，就明白了。

今雖暫用「半殖民地的市場日本」的用語，而現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不一定有同一的內容，自不待言。這雖然是歷史上的第一步，是前提條件，但也就是列強以資本主義階段特有的方法與內容榨取日本的狀態。雖然一切都是為本國產業，以保全或擴張市場為目的；但方法不一定盡是和平的「廉價商品」。新市場的開闢，似皆以強力為之，條約含有若干強力的規定，更是當然的。安政條約與以前強迫中國的各项條約，除去鴉片問題以外，在本質上全是同一的東西。

在安政條約上，這種強力的規定，如關稅非自主權，低率關稅，治外法權，居留地規定，最惠國條款，及其他等等的結合都是。試就日英「修好通商條約」論之於左。

公使駐紮首都權，及「負政治上責任的官吏與政府要人」的內地旅行權（第二條），尤

其是前者，在中國也剛剛因二個月以前的天津條約，在砲火之下得到承認。不過對於一般外人的旅行權，與天津條約以前的中國，一樣的受限制（第三條）。

三港兩市的開放及居留地的規定（第三條），和治外法權（第四至第七條），在中國是由中美條約（一八四四）開始規定的。居留地的規定，原來不論在中國，或在日本，與內地旅行權的限制，同含有使外國方面不自由的意義；然由治外法權及居留地自衛權連結起來觀之，倒帶有半殖民地的性質。

外人的信教自由（第九條），「不列顛海軍所準備的東西不納稅，不列顛政府官吏，在神奈川，長崎，箱館起貨，應確實納之於寄存的倉庫內云云」（第十一條），後來就全發展為軍隊駐屯權了。

關於貿易的大則（第十三—第二十條），對於輸入商品內地關稅的禁止，及其他基本規定，以別冊規定關稅及其他細則的貿易章程，否認了「視為此條約的一部分」之關稅自主權。

關於改正條約的規定（第二十一條），在一年以前通知會修改意見的權利，須至十四年以後才可以發生。

最惠國條款（第二十三條），在中國雖由俄國開始以明文規定，而着先鞭的是美國。不論如何，此種條文，在資本主義的侵略上，是最有強力作用的。關於稅率低下的幕府，關於修改條約的明治政府，因此全都嘗到了苦味。

安政條約的雛形，幾乎是哈里斯一方面作成的。哈里斯所宣傳的「公正」形態——「所

謂萬國普通法，究竟是什麼東西呢？

「第一就是治外法權」

以砲火獲得的天津條約，定規輸出輸入，都是值百抽五。安政條約，對於美國利害最多的輸出稅方面，也與天津條約一樣，一律值百抽百，其輸入稅，

第一類 無稅貨物——金銀，現用衣服之類及其他自用品。

第二類 值百抽五稅貨物——修造船舶的用具，捕鯨用具，蒸汽器械，亞鉛，鉛，錫，木材，煤，鹽，鹹食物，鳥獸，麪包，麪粉，米，粟，生絲。

第三類 抽百分之三十五的貨物——一切酒類。

第四類 抽百分之二十的貨物——以上三類以外之貨物。

若平均計算，不論如何，稅率也是相當的增高，比前章所見的俄國及荷蘭追加條約，值百抽三十五的稅率為低；但對於列強產業，是很可憐的。尤其是英國視為武器的棉製品等等，並在值百抽二十的貨物之內。而美國輸出物的重要項目，完全歸納在值百抽五的稅品中。

英國於日英通商條約中，將「木棉及毛的製品」奪回於五厘稅貨品之中，因此安政六年所締結的英美俄法荷五國關稅稅率，就算依照最惠國條款與英國的修正稅率一致了；不過在文久以後，處在國內極度不安的幕府對外交涉下，這次也不得以稅率減低為主要的交換條件了。

文久元年派遣交涉延期開闢四港的使節，以倫敦覺書（一八六二）為右列延期五年交換條件之一，要求減低酒類的輸入稅，將玻璃器編入五厘稅品之中。

文久三年派遣的開港談判使節，在巴黎條約（一八六四）減為製茶具無稅，酒，白砂糖，鐵，器械，麻織物，時計為五厘稅，玻璃器，香料，兵器為六厘稅。

最後為大阪條約（一八六五）及基於大阪條約的改稅條約（一八六六）輸出輸入一律五厘的天津條約之稅率，因此而逐漸實現了。

外國軍隊的駐屯權，最初是警備橫濱權的形式，被攘夷討幕派壓倒的幕府，不論在內政上或外交上，皆已陷於窮地，英法獲得了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事變以前的政情，繼前年的生麥事件及其他事件之後，英國與幕府在本年二月至五月之間，很有危機；三月二十日，英國公使以橫濱居留地不安為名，向幕府要求對在留英人總財產三百萬美圓，加以保護，幕府對之，開始給與口頭的答覆，「警衛一事，此方已專心注意了；但彼方的處置，亦不敢拒絕」，五月，法國以英幕府間的調停者的資格而活動，雖非公式的，但對英法兩提督，允在日後與以橫濱居留地警衛權，繼而不得不約定在橫濱以幕府費用建築外國兵營之旨。若不如此，將以彼時正在交戰中的長州領域內（聯合艦隊，砲擊馬關，雖在元治元年；但其前年也有四次以小砲轟擊）建築兵營為要挾。占地積約二萬坪的兵舍落成了，英國除水兵外，使香港陸軍之一部，駐屯於此。法國於明治五年，英國於明治八年，才漸漸實行撤退駐軍。

說到德川幕府末季的「半殖民地」事情時，上列諸事項，不能不與內外政情的全體性共同理解之。例如遠東貿易上戰略地點的對馬，若沒有英俄的均衡，則陷於香港的同一運命，也未可知。但產業資本主義的全盛階段，也有一定的限度。僅見到「侵略的列強」的強力量方面，不詳察其強力基礎的產業及商業，恐怕不能得到真正具體的德川幕府末季的外交史，

一八六七(慶應三)...	輸入	一、三四五、〇〇〇	一三、五〇五、〇〇〇
一八六八(明治元)...	輸出	一、六四九、〇〇〇	一六、〇四九、〇〇〇
	輸入	一、九三七、〇〇〇	一四、三三一、〇〇〇
	輸出	一、九八九、〇〇〇	一八、八八七、〇〇〇

右表所列輸出輸入各國的分額，用一八六三年神奈川一港的數字觀察(單位磅)。

國旗	輸入	百分比	輸出	百分比
英國	六三、三二	七六、三	二、一九四、三九一	八一、一
荷蘭	七三、六七	八、九	一七二、七三四	六、六
合衆國	七〇、四八	八、六	一六一、七〇三	六、二
普魯士	一九七、二	二、五	九五、一七七	三、七
法國	一〇、一七	一、三	四六、七八九	一、八
俄國	二、三九八	〇、四	三、八一〇	〇、六
合計	八一、二四六	一〇〇、〇	三、三三八、五〇三	一〇〇、〇

，也是相同的。

茶葉由橫濱輸出的數額(單位磅)

但在南北戰爭的一八六三年，美國的比率，當然要低降的。就左表關於茶的歷年表觀之，南北戰爭以後的美國，在日本的輸出貿易上，有何重要的分額，是很明瞭的。就南北戰爭前觀之

美國對中國的輸出貿易，不劣於英國。關於茶及絲的輸出額，分列如下：
第一表茶（單位担）

輸出地	一八五五—一八五九	一八六〇—一八六四	一八六五—一八六九	一八七〇—一八七四	一八七五—一八七九	總計
倫敦及歐洲	二、三三〇、二九九	二、五七三、〇三三	九八八、七四三	六六七、〇六一	七七二、三三三	
上海	一、三三〇、七五二	一八六、六六三	二、五八六	—	—	
香港	三〇、五九八	二四、五二〇	二、五八六	—	—	
合衆國	一、九八八、八七八	二、九五五、九八一	六、五三三、三三三	六、二八八、七九〇	七、二二二、七〇八	七、九五八、四六六
中國	—	—	—	—	—	七、四三六
合計	五、七〇七、五三七	五七、五九、一七〇	七、五三四、五六二	六、九五五、八五一	七、九五八、四六六	

年次	中國	日本	印度	錫蘭	爪哇	總計
一八四九	四一六、四四七	—	一、七四〇	—	—	四一八、一八七
一八六七	一三、三、五六七	八九、五四四	五、三三〇	—	—	一、四五六、三四一

絲(單位噸)

一八八六	二、二七、三〇一	二七五、八三三	五五、〇七八	六〇、八三三	四四、〇〇〇	三、一〇四、九五三
一九〇五	一、三六九、二九八	二八九、四三二	一六、七三三〇	一、三三八、二六〇	一九一、〇三五	四、五三三、三七〇

年次	中國	百分比	日本	百分比	印度	百分比	小亞細亞	百分比	法意	百分比	合計噸
一八五七	三、八六九	?	—	—	?	?	—	—	?	?	?
一八七〇	二、三三八	三五、九	六三三	九、七	六三七	九、六	—	—	二、九三九	四、八	六、五三七
一八七七	三、五四八	四二、三	—	—	—	—	—	—	—	—	—
一八八七	三、八七〇	三三、五	一、一〇二	三、一	六七三	八、〇	六二	七、四	三、四八八	三九、三	八、三九〇
一八九七	六、九四七	四一、六	三、一三三	一八、七	二七五	一、六	一、四七九	八、九	四、八七七	三九、二	一六、六九八
一九〇八	七、九七五	三三、三七、五三一	三、一四	三五〇	—	—	—	—	—	—	—

德川幕府末季輸出品中有特色的，就是金幣和棉花。輸出雖然永遠是超過輸入的；但在開港後一二年間，大約有一億圓金幣的流出，而商品一點也沒有介紹出去，這是幕府積年貨

幣改惡策的報應，開港當時的比價是金一銀六，歐美的比價是金一銀十六。這種巨額的金幣流出所發生的破壞影響，為時雖短；但是恐怕可以與中國鴉片的影響相伯仲了。

棉花之所以能够大量流出，是由於受美國南北戰爭的影響，在戰爭期間繼續輸出。一八六二——一八六五年之間的總輸出額（單位捆）

輸出對方	一八六二—一八六三	一八六三—一八六四	一八六四—一八六五
英 本 國	一、〇三六	四二、二一六	九、四八〇
上 海	五〇二	一、六六四	—
香 港	八、一〇七	二八、六七一	五、八八五
合 衆 國	三四二	—	—
合 計	九、九八七	七二、五五一	一五三六五

近代的生產物之輸入，比起輸出來，還是輸入有重要的意義。關於列國輸入的分額，能以數字表明之，甚為遺憾，但在與中國情形相同的日本，不論在數量總額上，或是近代的生產物在其中所占的比率上，都是英國占絕對的優勢，自不待言。

就一八六三年橫濱稅關所記錄的英國輸入品觀之如左。

品目	數量	價格 (美圓)	價格百分比
線織法蘭絨等	比斯六三、三六五	九五〇、四七五	三七・三
天鵝絨類	比斯八、四三一	九二、七四一	三・六
無染棉製品類	比斯七三、二六一	二九三、〇四四	一一・五
縲紗類	比斯二〇、一〇六	六〇、三一八	二・一
毛棉混織物類	比斯六、六七二	三三、三六〇	一・三
鉛	磅三三、九九三	二二三、九五二	八・八
錫	磅六、五二〇	一八二、五六〇	七・一
錫板	箱二、三三三	二〇、九九七	〇・八
亞	磅三、九五九	二七、七一三	一・七
小	鎗	八〇七	〇・四
銀	磅	一一〇	〇・二
		五、二三八	

慶應四年正月三日鳥羽伏見之戰開始時，舊幕政府，立刻要求列國中立，新政府也在正月二十一日要求局外中立，列國公使在二十五日，同時宣布中立。

自此以前，正月十日，新政府以王政復古，通告各國公使，同時表明自今以後，一切舊條約，皆以天皇名義執行，到了二十四日，獲得諸公使「自今以後，以朝廷爲日本的主府」的答復。同月三十一日，各國公使進宮參拜，帕爾克斯的遇難，也平安無事的度過了。

對於一貫的內亂之過程，聲明局外中立的列國，尤其英法間之對立與均衡，其內部。營着重大的作用。

不過僅看到英法片刻的對立與均衡，是不够的。在本質上，兩者有更大的對立。德川幕府末季的日本，可以說是由狂暴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時代脫免的餘生。

論，即內閣首席，廣田氏本人亦不能知此等國策中，以何者為真正國策；甚至對財界統制壓迫民間事業，取一致反對的態度。後者即刻遭受軍部對國防一律詮議之反對，軍部始終主張「國防先議」。如此言之，以其他國策為牽制國防費之膨脹方策，已無望矣。國策閣議終了之始末，即如上述。易言之，即政治上之根本的支配者，與直接支配者，及與執行政治機關之間，有隔閡存在，故國策閣議，遂毫無所成。

然若依政府方面之陳述，謂國策閣議，雖告終了；而國策審議之原則，則不可拋棄。使各省政策，以書面提出於首相及藏相手中，由兩省加以檢討整理，然後確立國策。然而各省大臣，動輒欲予以國策之名稱者，其企圖究不知何在。以改善推檢待遇為司法國策，當作別論，茲將應付非常時期的經濟財政國策之企圖，加以研究。

異常困難的產業貿易國策

非常時期國策意義之所在，恐即係應付日本危機的國策。今日之軍部，固依存於國民經濟；然國民經濟，必須於現代的必要水準之上，保證對軍部的供給。現代之××××，不僅關於兵力之組織與準備，需要了解，即在積極方面，對國家一切資源之準備，亦必須有相當的了解；不過日本現在的產業，是否能保證××現代的必要水準，其答案恐係屬於否定方面。

於是即商工省所企圖之燃料，鋼鐵，纖維補充策，恐亦將稱為國策。此等資源，均感不足。例如燃料中之煤，木炭，國內雖可供給；但關於液體燃料之石油，則有百分之十，不能供給，遂以外油且為由英，美資本經營之外油，填補此不足額。滿洲之石油資源，殆不可望。

輸入之報復，結果僅有輸入品代價之騰貴，及國內同種物品價值之暴漲。此點與前述之原料國策，後述軍需工業之助長，互為因果，對國內的影響，恐有特別周密的反省之必要。歐洲大戰當時之德意志，已有此經驗，今日尙繼續飽嘗同樣之經驗。關於景況之確保，縱謂為今日非常時期之預備，而犧牲則為現在景況對象外之產業，引伸之，則為國民大眾之負擔。國內工業品輸出之比例，達百分之二十強，其所期望輸出者，比英，美，德諸國為大，日本是否可以轉變從來之貿易方針，誠屬疑問。德國今日缺乏食糧，苦於食糧市價之騰貴的現狀，對於此種景況，恐亦給與一大暗示。

再次，所稱之國策，為遞信省之電力，海運，航空國策。在電力方面，即所謂以國款担任發電之設備，而謀電力資源之擴充，電力供給之增大，電力代價之減低是也。或者認為日本有意以電力補充動力資源之弱點。在水力資源豐富的日本，確有向此方面注意之可能；但能否以電力國營，除去利用水利之季節的不均衡性，或以低廉代價供給，亦有疑問。海運國策，豈非徒然增大國庫之補助，而更加保護財閥之資本？航空國策，鑑於從來我國國民間航空之不振，欲依軍事上之必要而助長之；然如對於航空工業之助長統制，每年支出將近一千萬元之助成費，使民間之資本動員，頗感困難。軍部之所以反對遞信省的柔弱航空國策者，不亦宜乎！

若檢擇上述以外各省所提出之國策，實不遑枚舉；綜之，非常時期所應預備，……未達現代的必要水準之資源確保，恐即係一般所稱之國策。然而此等資源之確保及充實，係永遠需要國家之保護及助長，或於國家保護之下，需要民間資本之動員。但若就民間資本動員言

之，因資本爲利潤本位，處理本位，故國家之保護助長，在達到處理本位之前，不得變動。如製造汽車事業法之制定，爲三井，住友財閥所欲逐漸進出者，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油田燃料工業之確立，及財閥資本於爲合理的出資程度上之現狀言之，亦係如此。更就對滿對華國策上觀之，且有資本將抑制投試的現狀。資本之態度，既如上述，所謂國策，恐必須有預計以上的國家巨資之補助。日本今日之財政，對此國策，甚難忍受，爲顯而易見之事實。日本帝國，必須以其軍事力之強，填補其經濟力之弱，然後乃得與列強抗衡。此種命題，即在今日，仍應認爲妥當，故在國策上之國防第一主義，乃不可避免者也，結果，即產業之中樞，恐亦須置於軍需工業之中矣。

國防與財政工作

所謂軍部以充實國防爲第一義者，有如前述，日本從速補充經濟之衰弱，除充實軍力外，別無他法。以經濟的方法，整備日本經濟之衰弱，以軍需工業之確立爲充實軍力之中心，最爲敏捷。國防比繁榮更加重要—Abarn Smith—一語，遂爲一般人所共唱。

軍部之新國防計畫，據傳聞所得者言之，在陸軍方面，似以擴充航空防空之設施，充實在滿兵力，整頓機械化裝備，及化學戰裝備所需之作戰資料爲基礎；在海軍方面，第一次第二次補充計畫，雖以補助艦爲對象，但第三次補充計畫，似以建造主力艦之代艦，及擴充空軍爲中心。至於此新國防計畫所用之經費，無論任何一方面，最初年度，亦須二億至三億圓之鉅額。結果陸海軍之經費，必至造成於今日十億圓之上，更增五，六億圓之狀態，依此種情形觀之，明年度之國家預算，將由二十七，八億圓，增至三十億圓。蓋就今日之國際狀況而

論，國防之落伍，即屬致死之一道。倘產業貿易，即係所謂軍備——馬場藏相！恐無議論之餘地矣。設若軍部及財務當局抱持此種態度，政治以軍部為轉移，則國防費第一主義，將無所底止，因而其餘國策所需之經費，必為財源所困矣，故若以國防為第一國策，其餘國策，終將有名無實，僅有關於國防之國策，方得確保其預算，恐必在此限度之內，方能視為國策。然因軍事費拋出將近百分之四十於民間，明年度之預算，若依前述之國防預算觀之，將以六億圓以上之鉅款，散布於民間工業，於是產業國策，在國防關係上，恐將直接間接逐漸確立矣。

然依是而論，以國防為第一義之國策，所給予國民經濟或廣大的國民社會的打擊，即係國家財政上的直接打擊須覺悟。即占國家預算半額以上的國防費之財政，將造成如何的不健全，無特別說明之必要。又國家財政，吸收國民所得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畸形狀態，實堪令人胆寒。而且國家對於此等龐大的經費，勉強實施赤字之增大。政府對於國防費之增額，以三億圓新增之稅收，及增加七、八千萬圓特別會計利息之移用為財源，希望以此減少赤字公債之增發。不過新增之稅收，共所觀者，資本稅甚少，置之於大眾稅，則因使大眾窮困之故，預算之增收，必無希望，甚為明顯。由資本稅之所得稅，營業收益稅，資本利息稅，繼承遺產稅之增加，或財產稅之創設等，希望巨額之增收，實不可能，政府今日對於資本，施行壓迫，行將實現。縱對直接受軍事費膨脹利益之軍需工業，實行增稅，而一切軍需工業之助成，將陷於與其期待完全相反之結果。關於特別會計利息移用之增加，及希圖在大眾消費品中，擴張專賣事業案，大眾對之，必不甘心。結果不得不依公債財源為之，不得不由增發赤字公債

爲之。公債之滯銷，雖因現在改五厘利息之公債爲三厘五毫而繼續下去；但赤字公債，仍然依次爲巨額之增發，於是公債恐將由滯銷而變爲不能出。財政之崩潰，乃勢所必至之事矣。

日本經濟之前途

綜上所述，所有一切國策，除國防國策外，餘皆不易實現。不過在濃度國防之關係上，其餘國策，亦將爲實現可能之國策。但因任何國策，皆須消耗國家之莫大經費，故在國民大眾犧牲可能的狀態中之財政，必將崩潰，只有軍需工業之好況，可以預料。然軍需工業之好況，亦以和平產業之負擔，是否可能爲斷。

所謂通貨膨脹的景氣，至昨年爲止，雖尙含有若干景氣好轉之要因；而此有力支柱之輸出景氣，將行退後。如是生產的產業之停頓與國家經費之膨脹，赤字公債之增發相反而並行，於此即可察知新通貨膨脹之前進矣。

欲以統制經濟爲國策，防止以上之惡傾向，就現狀言之，亦屬至難。蓋政治與經濟不一致，其間即有裂痕之存在也。日本經濟，就暫時而論，恐仍係以混沌之現狀前進。但結果恐怕只有惡性通貨膨脹的波濤，日漸增大吧。

英日對華協助與太平洋問題

(一)重彈英日同盟舊調

H原勝
譯作

東京朝日新聞於七月三十一日揭載了一最近李茲羅斯氏回國，對於中國實情與日本之立場，從政治與經濟兩方面，作了極堪注意之報告。「英國政府期望着以中國經濟復興為中心之減低關稅問題，通貨問題，華北問題等重要的提議，希求以中國為媒介之英日協定得以完成。」倫敦特電後，不久又刊出倫敦特電，「謂賈德幹前英國駐華大使之後任者許格遜氏，近將赴任為駐華大使，氏以日本對於中國問題之立場頗堪重視，故於離國之前，曾往訪吉田大使，關於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之對華意向，曾澈底交換意見，許氏亦述及英國對此項問題之希望與意見，並力言英日在遠東協力之必要，艾登外相亦完全同意其意見，故預定在赴華履新前，先往日本一行，訪問東京，與朝野之有力者會見。」（八月二日），更又登載一篇社論謂「斷定英日親善為最近日本的外交政策之決定的新動向，這縱不正確，但至少我們不能否定現在在朝野之中有相當有力的支持者的這事實的，不但如此，一般論者亦似欲於英日親善中，尋求日本外交國策之基調。」又作結論道「日本之遠東安定勢力的地位，與英國之提攜而更趨鞏固。反之，利害關係最為密切的兩國之無益的仇視，足為另一勢力所乘，這是應該明白的。要言之，以英日提攜為日本外交國策，雖是謬見，但吾人相信這種提攜是當作外交國策基本工作之一，而加以考慮的。」對於新起的英日同盟的趨勢，與以贊助。這件事情，與現在憲政日本的兩大政黨之政民兩黨（雖然它們是由日本的一般國民的虛無主義造

成的政黨），向廣田內閣要求外交國策之第一義的確立，同為積堪注目的國際政治現象。

(二) 英美對日戰略之轉變

以「滿洲」事變為轉機，美國急於嚴守其在華利益，竟有司丁遜所謂決心與日一戰之激言；反乎此。英國的西門氏則以承認日本在「滿」行動，或支持日本在「滿」行動，藉以確保其在華利益。西門氏的這種態度，在彭比氏之訪日與李茲羅斯之訪中日，明顯地表現出來，而且這種態度成為至今為止的英國對日外交的主調。不過，這是有着重要的前提條件：日本統制「滿洲」後，不再支配中國，威脅英國的權益；假如可能的話，出馬反蘇戰爭。

然而現實打破了英國的這種希望，日本踏進了與「滿洲」有密切關係之熱河，更又進至華北，避免反蘇戰爭，且公然喊出驅逐英國。於是英國便由日本之急進的向大陸發展的旋風之中，轉而為中國之半殖民地的地位之擁護，同時緊臨着確保其在華利益與地位之緊迫問題，而不能不變所謂「西門政策」了。但這時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却由司丁遜之武力對日保守在華利益，而澈底轉變為藉對日經濟鬥爭（例如金融貨幣戰或滙兌戰），以求在華利益之擴大了。

(三) 歐洲政局之混亂

同時錯雜的歐洲政局，又有激烈的變化，如義大利之侵阿，德國之退出國聯，斯特萊薩戰線之崩潰，歐洲集團安全保障之破碎，西班牙人民戰線之成立，世界軍縮會議之決裂，英美建艦競爭之激化等國際政局的變動，是頗為激烈的。因為這個原故，英國在世界市場上之投合大眾的商品輸出者的支配地位，受到日本的威脅，而且雖然被由遠東的巨大的預備市場

的半殖民地的中國驅逐出來，却又不能決心與日一戰，以確保自己的地位，依然不得不採取「西門政策」了。尤其是因為英國金融資本家及重工業資本家，與美國的金融資本家及重工業資本家互相爭奪着市場的支配權之故，英為加強其對美的競爭力起見，就得充分地評定日本在遠東的地位與任務，而將其利用，使於本國的目的利，這一點使英國不能對日作戰成爲更決定之事實。

上述之英國不能修正的「西門政策」的對日路線，最近忽然十分明瞭地顯明起來，關於這一點，我們須對下述的情況加以考察。

(四) 急進派的傾向

因爲李滋羅斯之調查中國，才決定與日合作，使中國脫出政治的不安，爲確保英國在華利益之先決條件，而且認爲只有如此才能使因中國經濟之開發而擴大本國的利益，成爲可能，但在最近擊退了英國的「西門政策」的日本對華前進的急進派的傾向，則是因二，二六事變，而受一頓挫的北守南進政策，重又抬頭起來，成爲輿論之一部，海軍大將之宣佈台灣武官總督制，以川越赴任爲轉點之以對華的經濟進展爲大綱的決定，以及從前主張爲使日本在華勢力擴大起見，爲使「滿洲國」發展起見，爲阻止蘇聯之向遠東侵入起見，有與英國作政治的妥協而得到其財政的援助的必要的金融資本家，地主及官僚一派之抬頭。英國想在日本發生了這種風潮的時候，用英日同盟的復活或親善之提倡以抑制妨害其在華利益的日本急進派。

(五) 使英日締結協定之各種要素

然則日本與英國以中國為媒介，要在那一點上才能完成協定呢？

第一是擊破中國的紅軍，消滅共黨，使威脅資本主義體制的中國蘇維埃運動粉碎。中國蘇維埃政權如果統制了全國，則對於日本是一個大的威脅，對於英國是其印度支配權的危機。英國很明顯是對此點與以關心的。因此，英國充分地研討「維持東洋秩序者」的日本與正而和共產主義努力對立之東洋最有力的日本，想利用日本，以保全自己，而不致斷送其印度的支配權。

使英日協調的第二要點，是以世界為舞台，到處與美國對立的英國，與挾有太平洋而與美國對立的日本之共同戰線的形成。

南京政府近年以來，以其國庫之大部，用之於軍備的擴張，其假想敵無疑是日本。對於中國政府之擴張，以最大的熱心參加的是美國，據斯特倫所著之「轉換期的中國」所載，美國於一九三四年供給南京政府以大批的飛機與載重車，又據日本各報所載，美國又供給中國約值三百零五萬元的軍火，最近報紙又有巨額的「中美借款」，「軍需品的供給」等消息。（此項消息已為中國當局所否認）。

（六）香港與新嘉坡問題

使英日接近的第三要點，是香港與新嘉坡問題。香港對於英國，是發展在華經濟勢力的根據地，新嘉坡是其遠東政策上之重要的軍事上的要港，但兩者均為操縱於日本手中之經濟的海港都市，或海軍根據地。如果英國與日本衝突，以現下之太平洋上的海軍勢力攻擊日本，是不難制勝的罷。這一點與英國的國防委員會將軍備的設備以美國為目標的，這一點合併來

看，很顯然是使英日協調提攜的條件。

使英日由親善的接近，進而為舊同盟的復活，其原因除上述數端而外，尚有陸克所提出的澳洲問題。澳洲是日本最好的市場，是四倍以上的入超國的顧客，所以當然是英日所注意的問題。

(七) 英日的對立

如同定律中有反定律同樣，既有使英日接近的各種條件，也有使英日對立的各種要素，國際政局，是這些關係複雜地連結在一起而轉動的，所以我們不能忽視其相反的一面。

使英日對立激化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勢力之增大。所謂「飛躍的日本」的勢力，在政治與經濟兩方面威脅着英國。在印度，澳洲，及海峽殖民地，日本之廉價的工業品的狂銷，壓倒了英國的貨品，終於英商使本國政府實施保護關稅，並採取對日貨加以限制的救濟方策。日貨同時又將英國商品由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有重大意義的中國市場驅逐出去，日貨充斥於中國各海港——尤其是華北，日本支配中國之日，即英國在遠東勢力全部瓦解之時。這裏便埋下了英日對抗的根了。

使英日對立深刻化的第二原因，是歐洲問題，尤其是法西的德義問題。如果英國公然承認日本急進派在華的大陸政策，則失去非難攻擊希特勒與莫索里尼之破壞歐洲諸和平條約的論據，而且還要受到他們的武裝的橫行的威脅，不過這個條件是不致阻止英日接近而使英日對立深刻化的。

(八) 太平洋爭霸戰與美國的戰略

不論英日之間怎樣的有接近的可能性，結局太平洋爭霸戰是要盡全力決戰的。這決戰必將因美，法，及其他國之加入而更複雜。在目前英與美之間雖消除了世界經濟戰之最後的戰源，但對於以中國為中心的太平洋爭霸戰，美國則使英日的對立無可避免地激化，自己則退在背後，專心於軍備擴充，取着在兩敗俱傷之時再乘機而出的戰術，所以表面上是平穩消極的，而在中國市場的經濟戰，則是在以巧妙的兵法而勇敢地奪取着支配權的。

在貿易戰方面，自「滿洲」事變以來是取得第一位的優勢的。但對於可稱為中國市場的決戰之貨戰，亦以陳光甫之訪美而取得了勝利的機會。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白太平洋的爭霸戰，勢必使英，日，美之間的一切矛盾日益深刻化了。

中日經濟提携論

K 猪谷善一
譯

(一) 中國對日政策

中國政府之對日政策，在張外交部長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央紀念週中所作之外交演說裏，有了說明。張氏以爲中日兩國必須提携，以爲中日兩國倘不急速調整國交，則不但於兩國不利，且於東亞和平亦有莫大之影響，復謂他以充分的決心，努力於兩國關係之調整，他說中日之間雖有嫌怨，但他相信有和平之途，所以不能不作最大的努力，使兩國當局互相諒解其立場。

(二) 經濟提携之目標與方法

中日經濟提携已經唱得很久了，然其內容，則茫茫然難於捕捉。去年九月，廣田外相，以(一)澈底取締中國之排日抗日(二)中日「滿」之政治的及經濟的提携之實行，(三)共同防禦華北及邊境的共產黨等三項爲對華方針之三大原則，並要求中國承認。中國政府則要求日本對其內容作具體說明，僅有數度之外交交涉，即告停頓。自後約過半年，六月末，川越赴任，又提出中日提携的問題。其內容是有助於中日問題。其內容是有助於中日兩國的經濟提携。華北的經濟開發是有助於兩國的，所以想先從華北的經濟問題着手。經濟提携的目標，是農產品的改良，交通機關之發達，礦山資源之開發，其方法則爲中國先拿出資本，日本再與以材料與技術的援助，

(三) 所謂「特殊貿易」問題

不過在未進行這種經濟的工作之前，第一成爲問題的，是華北之特殊貿易問題。此項交涉之進行，必須使冀察政權與日本調和；所以中國政府似將任命擅長經濟財政的王克敏氏爲財政經濟長官。中日兩國政府之間，似難有使雙方滿足的工作，但吾人在悲觀之前，不能不期待其努力。

華北特殊貿易之中心實體，是日貨的走私問題。走私在南方的福建，廣東沿岸，北方的渤海沿岸也頗猖獗，這雖有種種原因，但奸商無恥爲其主要原因罷。

(四) 走私貨品之種類

全中國的走私貿易總額，究達若干，此爲頗有興味之問題。據E卡恩氏之調查，一九三五年的走私總額爲三億元，或二億一千萬元，達同年商品輸入總額之百分二〇或三〇。走私的貨品，主要的是鴉片，紅丸，白面，及人造絲，糖，毛織品，棉布，穀等。密運的貨品本以寶石金屬之類爲多，但在中國則以日用品爲大宗。這不待言，是因爲中國內地不能以低賤的價格生產這新商品，而不能不求諸外國的原故。

華北貿易問題，現在已不但是在中國與日本成爲問題，在倫敦與華盛頓亦引起嚴重的注視。華北貿易之所以如此的成爲國際關心的對象，不待言是因爲這會使各國失去其在華北的經濟的地位之故，但其另一理由，則爲中國海關收入大部份爲償還外債的担保金的原故。

(五) 中國海關的損失

中國最大的債權者而握有中國海關實權的英國，對於華北貿易問題，特別注意。李滋羅斯在與前天津總領事的現在川越大使會見時，也吐露了希望日本政府對此有妥善的處置的口

物。

據中國海關的調查，華北的海關損失如次：

(一) 自去年八月一日至本年五月十日止，海關損失為三千萬元。

(二) 本年四月中旬的海關損失約八百萬元。

(三) 去年八月至今年三月的八個月中之平均損失為百七十萬元。

(四) 因四月末之激增，海關的損失，年額達一億元，佔海關全收入之三分之一。

此種漏稅，大抵因「稅率過高」而起，故其改革方法，必須中國政府澈底修正現行稅率，減低中國大眾生活所必需的棉，絲，布，糖，人造絲的關稅，並確立使海關收入按照地方情況分配的政策。只有根據這種基本原則，華北的政治混亂，以及海關體系之錯綜才能解決。

(五) 華北經濟開發的路線

華北之經濟的開發，必須以中日「滿」之布洛克經濟的關係為前提。但如同世界其他的布洛克經濟同樣，在內部，隸屬的榨取關係不能居於支配的地位，在外部，排他的獨佔關係也不能立於支配的地位。華北的經濟開發，應循這個基本路線前進。

(一) 關於華北經濟的開發，應第一着手而與以重視的，是資本的問題。因為華北與「滿洲」同樣，資本的積蓄，是無足觀的，這是很明白的事實。在這裏有所謂平津的財閥，他們擁有相當的資本，不過平津所存的資金的大部份，均屬於在平津以外有本行的銀行的，所以單以平津財閥的資力開發華北是不可能的，正如川越大使所說，中國的資本是必須的，但

日本的資本與技術，也是必要的。

(六) 日本的資本與技術

容納日本的資本與技術，第一認為必要的，是貨幣制度的改革。這徵之於「滿洲國」的經驗，也是不難明白的。「滿洲國」之使從前的紊亂的貨幣制度統一於國幣的事實，對於「滿洲國」的經濟是有莫大的功績的。雖然如此，至最近為止，因為日本與「滿」元沒有統制。在日「滿」的布洛克經濟上仍有許多的障礙。即是說，在華北的經濟開發上，要緊的是迅速設立中央銀行，實行中日「滿」的通貨統治。

在投下資本的時候，是不能沒有統制的。這即是說，華北的投資，須在某種程度上實行投資的方向，種類，及數量的統制。關於對「滿」投資，我們已經指出統制的必要性。與這同樣，關於對華經濟開發的資本統制，須由政府經手，這在華北開發之國策的重要性上，並且為謀「滿洲」與華北之均衡的開發起見，是頗必要的，但對於這樣投資的資本活動——尤其是以資源的開發為目的的企業，是不能有軍部的統制或官僚的干涉的。由在「滿洲」所得的經驗看來，也必須是更為開放的。

(七) 以農業為主要之經濟開發

(二) 其次的問題，是在開發華北時對於日本及「滿洲」之競爭產業的處理與國際關心之融和。關於後者，他們的懸念，不待言是為單純的現象所拘的。不過糾正這種誤解之最善方法，是拿現實的事實以闡明日本的真意。要做到這一點，中日「滿」之互相依存，共存共榮是不可片刻遺忘的。

(三)華北因爲是農業地方的原故。是應作以農業援助爲主之經濟開發的。棉花在河北，山東，山西，其栽種面積與產額，達中國全部的三分之一以上。小麥也是如此。羊毛則佔全華百分之二九。不過這些品質，不能充分直接作爲日本工業化的資源，日本政府第六十九次議會通過的對華事業預算，以四萬元作在天津，青島等處設立農業試驗場與產業科學研究所之用，以資農業之科學的指導，同時又講種植棉花，獎勵羊毛業，改良品種，改善牧畜，手工業及粗工業之獎勵，及其他關於農業之全般的甦生方策，這不能不說是有益的事業。

(八)華北礦產及紡織業

華北的礦產，以煤與鐵爲主，煤之埋藏量爲全華總量二四八·二八七百萬噸之百分之五四，其中百分之五一集中於山西。鐵礦埋藏量爲全華總量一〇〇〇百萬噸之百分之一四，其他尚有煤油等礦產物，這須有澈底調查，以作資源開發之準備。

(四)上述之農產物與礦產物，均不能與日本產業競爭，其開發與經濟化，固爲切盼之事，但當前的急務，則爲由內地裝運此種財貨之鐵路的建築，滄石鐵路與大同——秦皇島之兩線，首先就被計劃着。

(五)但華北有若干的工業，與日本的產業處於競爭的地位，那便是紡織業，華北現下之紡織業，其狀況如下：

華北紡織工業(一九三四年之調查)

山東省

場數

錘數(千)

絲布生產額(俵)

棉布生產額(千疋)

日	六	三七四	二三三·三三二	二·八九五
華	四	一〇八	四七·一四八	—
河北省	九	三〇五	一七八·七四五	一·〇〇五
山西省	六	七一	四九·四三〇	二七六

鍾數約有八十萬，雖遠不及日本，但這部門的發展，却也使人疑懼其將妨碍日本紡織工業之前進。實行經濟提攜後，應使其平衡發展，競爭是要加以排除的。

現在華北的棉業，因一段需要，從事粗布的生產，即是應此種需要而促進的。日本在華北的工場，其企圖似在使用低廉的勞動力製造粗布。

集體經濟，在發揮集體中之互相依存性，而作統制的國際分業的一點上，有甚重大之意義。中日「滿」的經濟布洛克，必須是此種互相依存性之發揮，與統治的國際分業之實現。所謂互相依存，不待言是以不偏於一方面的利益為主眼，而以全體的利益為前提的。

日本的對華國策

中央東京社分社

我們到了東京之後，最普遍聽見的呼聲，便是「確立外交國策」我們看來實在是意外的，難道在九一八以前，日本沒有「外交國策」麼？如果真是沒有，那麼在這五年中日本外交工作，是靠什麼來指導呢？從焦土外交到「協和外交」日本不是在世界舞台上充分表示過他的外交指導精神罷，我們越推敲越不懂，經過許多觀察之後，我們才得到了一個結論，所謂「確立外交國策」的呼聲，是從下列兩種觀念生出來的，第一有一部分識者深刻感覺現有的外交國策，是含有許多危險性的，非根本改造；必然的要遭遇極大的難關，第二有一部分識者也痛切感覺要推行現有的外交國策，非同時擴張海陸空三大軍備不可，軍費負擔過重，產業的發展當然受嚴重的壓榨，並且其他必要的行政也要受經費困難的影響，不能迅速實現。所以要求改變外交國策，這兩種觀念下所用的「確立」二字，實在是「改變」或「改造」的代名詞。

日本現行的外交國策是什麼？這一問可使我們爲難了，外交國策本來含有秘密性的，當然不是我們所能夠知道的，但是從國家行動看來，也未嘗不可以推測出片鱗半爪的，日本外交國策從對蘇對華對英對美的態度去仔細的觀察，似乎不至於不明白，這是不用不着我們來加以說明的。最近有田外相在閣議上間接答復社會上要求確定外交國策的說明，雖然不甚詳盡，也可看得出他的趨勢了。有田外相說「我們是有外交國策的，我們以對蘇聯爲外交國策的

中心，對華政策因與對蘇有關，所以也得慎重處理，「同時陸軍方面也說『日本外交國策早已確定了，現在只是實行問題，武力是外交的基本條件，所以不可不擴張軍備，外陸兩方的說法都是很明白的，但是有田外相所說的話只說了一面，還有一面是意在言外的，我們看來在軍事方面當然是以對蘇為中心的，在政治經濟方面當然是以對華為中心的，對蘇對華是互為因果的。因為要對蘇所以要慎重對華，因為要對華所以要慎重對蘇，再進一步說，對華政策是日本外交國策的中心，對蘇對英對美的政策皆由此而生的，稍為研究點最近六十年來日本外交史的人們，都可以斷言的，所以我們明白了日本對華政策，便可以認識日本外交的全部。」

西南事件解決後，日本人士對華觀念漸有轉變，這是事實，向來他們以為中國絕對沒有統一的能力，永遠在混亂之中，所以日本不必整個國家的觀念來觀察中國，所有種種對華政策，皆由此基本理論而來，可是最近因為廣東勢力崩潰的太快，而五年以來內亂差不多絕跡了，統一事業現在已經達到九成程度，才漸漸認識中國統一的前途沒有多大難關，團結的力量也不弱，所以社會上要求再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不約而同一齊發生了。我們要舉幾個實例來給讀者看，（一）高木陸郎氏是日本資本家中有數的中國通，他在八月十五日外交時報上做了一篇「最近中國之動靜」，又在九月號「文藝春秋」上做了一篇「蔣介石之資金網」，兩文大意相同，列舉近年中國鐵路，公路，航空，銀行制度，幣制改革，郵政儲金，政治統制力，科學的應用等等的進步，希望日本人士重新再認識中國，他說「只知道舊中國的人們，議論日本對華政策，反而使日本錯誤，這是我常有的感想，」（二）十何信二氏是經營

河北的興中公司社長，也是一位「中國通」他在九月號「文藝春秋」上做了一篇「對華政策的質的轉變」，他說「日本若只要有求必應那就不必說，假若要認中國是我們兄弟之邦，互相提挈，安定東亞，增進人民福祉，那麼過去對華政策不能不說是失敗，日本要求中國反省，同時日本也應該清算過去一切的一切，復還於白紙狀態，對華政策從第一步改造起最爲必要，」他又說「總而言之，在日本軍人也罷，外交官也罷，民間研究者也罷，他們不從大局觀察，把中國問題認做世界問題，僅僅偏促於四百餘州內觀察中國，討論中國，這是根本的錯誤，他們不但忘了世界，並且在中國也沒有充分與中國國民接觸，他們的對象只是軍閥的實力者，以及國民所敵視的土豪劣紳式資本家買辦之流而已，甚至以爲苟可以操縱他們，供日本目前的利用，便自信是對華政策，」這是很公正的議論，（三）日本名記者太田宇之助氏，在九月號日本評論上寫了一篇中國將完成其統一大業，最後結論說「中國若無和平，則東亞無和平，中國若不統一，則中國無和平，中國若無完全獨立，則中日兩國無真正提携，今日正爲日本改變中國觀乃至世界觀的時機，」我們認爲這是不朽的名言，這種論調在最近五年間絕對沒有看見過的，（四）石丸藤太氏是日本海軍軍人中有名的評論家，（現已退伍）新著「次回世界大戰」一書，討論今後世界大戰的原因在那裏，在「診察日蘇華關係」一章中，他說「國際關係只有利害關係，而推動利害關係的中心，就是外交上的欲取姑與原則（Give and take）換句話說「與」和「取」能保持均衡時，兩國間才可以維持親善關係，如其不然，關係必然疎遠，終至有「取」無「與」演成敵對關係……，中日間不能保持「與」「取」均衡狀態，中國採取以夷制夷政策，豈不是當然的麼，因此要求中國反省，真是不知

道外交常軌的門外漢的胡說」，他在「太平洋戰爭可以避免麼」一文中又說「或說國民政府的親日是假的，請看立刻就要脫下假面再抗日起來，好像看透了蔣氏的肚子，大聲疾呼力！對華第一只有用力才能壓伏中國，從頭就是打架神氣，那還有什麼轉向不轉向可說，根本上外交就沒有用處，還說什麼中日親善工作，這種意見，互相對立，形成二重外交，真是日本的不幸」，這位的論鋒；真是銳利極了，他又說「次回世界戰爭，中國站在那一方面，這是看日本態度而定的，如是中日真能達到提携目的，日美日蘇戰爭或且都可避免，無論在任何場合，日本態度是決定的要素」，眼光遠大，觀察透澈，我們只有感佩而已，向來對於中國問題好像抱有一種成見的大阪每日和東京日日兩新聞，最近半月也逐漸有些轉向，這不是暗示一種時勢的轉變麼，可是讀者不要太樂觀，這種議論雖然在社會上可以看得見，但在外交上政治上獲得決定力量，恐怕時機還沒有成熟呢，我們引證了許多議論，似乎把本題撇開了，那麼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實質，究竟有無轉變呢，從軍事的轉向到外交的工作，從政治的轉向到經濟的工作，這是很明顯的，川越大使到任的第一聲，便是「經濟提携論」，有田外相就任後也強調「經濟外交」的必要，這都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日本在通商方面現在遭遇了許多的困難，到處是碰壁的，假使不從經濟方面開闢一條出路，不特國際貿易立受大影響，就是國內工商也要受連帶的惡化，注重河北的經濟開發，這是一個原因，利用河北的富源來充實日本廣義的國防，增進日本工商業，這是再得策沒有了，日本對華觀念最近似乎有點不同，西南問題是一個極大的關鍵，他們知道中國不是「吳下阿蒙」，中央統制力是強大了，整個國家的形態是具備了，以各個地方為主體的外交工作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的

對象，只有一個國民政府，所以解決懸案減低關稅的要求經濟合作方法等等，都要依外交途徑來協商了。恢復外交常軌，這不能不說是初步的改善，日本感覺外交一元化的必要，其程度或者與中國相等，外交一元化問題，雖為三十年來懸案，但就最近五年事實來看，兩國識者尤痛切感覺糾正是刻不容緩的，在廣田時代曾經努力過，可惜沒有多少成效，在有田時代當然更須努力求其實現了。在現時情勢之下，一元化程度似乎做到了七成，還有一點癥結沒有完全打通，現時在內閣以內外海陸三相，每週於閣議散會後，必是聚談對華對蘇問題，常常討論，意見自易一致，一元化的環境比從前好多了。若是中央與在外的能夠完全一致，則一元化的外交便可實現了。我們切望中日兩國先恢復外交常態，然後再談具體問題，恐怕日本許多識者也是抱同一意見的罷。今日國人要問日本對華國策究竟如何，我們只有一個答復，名記者太田說「中國有完全的獨立，中日才有真正的提携。」同一筆法，我們要說「中國有整個的國家，日本才有合理的對華政策。」

中日關係再檢討

有吉明作
大公報譯

幾乎是絕交狀態

中日關係，就已往的經過看來，每當正要非常好轉的時候，總是起了個突發事件，弄的逆轉或是惡化；我自二十幾年前做上海總領事的時代起以至現在，覺得中日關係大體是走着這個路徑的。爲東洋的和平以至世界的和平計，中日兩國應該保持親善關係，這是彼此都知道的；而因爲突發的事件，把兩國的交誼害了，實在爲遺憾。很久的事情不論，單就最近說：昭和七年（民國二十一年）我赴上海就任公使時，因爲滿洲事變和積起的上海事件，兩國關係非常惡化，幾乎是等於絕交的狀態。我到上海之初，招待內外人士，中國方面，無論是老朋友或是在道理上應該出席的官員，實際出席者，合計起來，竟不到原所約請的五分之一。

一方面，由日本到上海的知名之士，他們想和中國有力者會面，也都說是有病或旅行去了，而被餉以閉門羹。像號稱親日家的黃郛氏，也是避面不見。

在那種絕交同樣的狀態下，日本商品的銷路，陷於停頓。以日貨爲必要的舊主顧們，關於買賣上的接洽，都要趁黑夜裏由後門悄悄進出。

因廣出外交而急轉

因爲種種的關係——在中國方面的一種意識：因爲恃着國際聯盟和拉着各國，都無濟於事；同時，和具有那樣實力的日本鬧起來，結果如何？又是很難預料的。所以一部有識者階

級，像當時的行政院長汪兆銘氏等從來所主張的「中日關係，無論如何，應該親善」的意見，便得勢了。他們領導輿情，使由興奮回復到平靜，在表面，在內裏，說服諸有力分子。以努力於中日懸案的解決和感情的疏通，不顧自身所被的攻擊非難，逐步進行調整國交的工作。那時適逢蔣介石氏由江西返南京，同時又有廣用外相渡華的傳說，蔣氏好像很相信的樣子，一月十八九日，有話傳來。說是希望我去南京一趟，我遂答應於二十五六日入京相晤。蔣氏當時是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雖說是以委員長的地位會見，可是我想若撇開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兆銘氏而會蔣，似乎不大方便。那時日本議會正在再開，廣田外相在議會演說，謂對華不侵略，不威脅，信賴南京政府，於是在南京起了反映，兩國關係，遂非常的好起來。我遂於二十五日赴南京，先會外交部長汪兆銘氏，他仍是提倡所主張的中日親善論，並就此關係應予增進之點，加以概括的談論。當時公使館附武官鈴木美通中將，曾與蔣氏會見作種種談話，我於第二天，由鈴木敘述他和蔣氏會談內容。第三天，記得是二十七八日，我便與蔣氏會見。

真誠的蔣氏之言

那次會晤的情形，迄今猶歷歷在心目中。蔣介石氏的語氣，熱烈非常，形於顏色，——即至今日，猶使人不能忘記。那次會見，黃郛唐有壬都在座，蔣氏說道：

「我在滿洲事變，上海事件發生，弄到今日的情勢之前，曾經很專心的等候時機，中日應該親善，是我的信念，我所尊敬的孫中山先生，是一向主張中日親善的。而不幸發生這些不祥事件，實在遺憾。中日關係如何調整？我不斷加以考慮，我認爲今日時機已到，

所以願意和你相見，就這個問題，不客氣的一談。這件事情，本來早想談一談。可是若在去年時候提出來，尙難得國民贊同，到了今日，國民已大部分明瞭事態的真相，大家的頭腦冷靜下來，所以相信他們能够隨着我走的。」

那個時候，是蔣氏所認爲兩國國交調整的好機會。

「中日本來是兄弟之邦，無論如何，應該互相提携以當東亞之局，我打算此時，向國民發表一個宣言。」

他在緊張的表情裏，繼續說着。我在那時，也把以前經過情形說明，並就將來的事情，詢問若干點。黃郛氏便叙述種種過去的歷史，潤色蔣氏的談論，我很覺滿足。

「蔣委員長若發表剛才所說的宣言，恰好日本議會正在開會，趕快實行，更能生效。」

我附加了這幾句話。

「這樁事汪院長也是知道的吧！」我問。

「大概提過，但還沒有詳細說。」

蔣氏答。我在前天和汪氏會見的時候，雖沒有詳細的談，然而這次我和蔣氏會見的情形，總算雙方都感覺滿意。

汪氏的親日宣言

這天晚上，黃郛氏來訪，說是蔣氏所說的發表宣言事，已和汪兆銘氏會談，作種種研究

，結果認爲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發表如此宣言，還不大好；不如由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氏出名，另由蔣氏切實表明贊同之意，方爲妥當，所以決定用此形式。我說：

「形式怎樣是無關係的，惟有希望汪院長早日完成宣言手續，將其發表」。

於是二月三日的中央政治會議，汪氏便作此宣言，蔣氏則通電贊成。汪氏的宣言，引證孫文氏在神戶的演說，相當堅決的提倡中日親善。從此又發布了睦鄰令，一時空氣非常改變。因爲如此，貿易關係且無論；凡一般中日人的關係，都異常安穩起來。平日不到我的地方來的中國有力人士們，都表示親近而來了。因爲有這些情形，所以我回日本的時候，便發生使館陸格問題，須磨總領事將決定大使館陸格事向汪氏通知時，汪氏喜悅之至，須磨辭出的時候，汪氏送出大門，而至汽車之旁。

華北暗雲與汪氏

中日兩國國交調整的曙光出現未久，去年六月下旬，便有華北事變，當時我正歸國，在事變後，我以大使資格，以七月十二日遞國書赴南京，是時汪兆銘氏以答禮來訪，這回他的態度却悲痛極了，他說：

「我真不明白中國的存在何害於日本與東洋和平？中日携手共保東洋的和平，是我的信念，若日本所考慮的和這相反，那就無可如何了。五十年百年之計，決於今日，固然不是件容易的事，現在只要決定五年十年之計，也就可以了。究竟日本要中國怎麼樣呢？凡日本所希望於中國的，只要是辦得到的話，即在今日，我還是願意盡力的，你還不相信嗎？」

這是那天汪氏非常沉痛所說的一句話。

眼光要放遠大些

關於調整兩國邦交，要常把眼光放遠大些。在兩國不能維持親善關係而互相提携的情形裏，要想貢獻於東洋的和平，是不可能的；爲兩國計，也是一件不利益的事。這個理由很明白。我因爲在華三年半的經驗，覺得中國的有識者和身居要路的人們，對於這種關係，都很明瞭。就大局的見地，對於偶然發生的感情上的糾葛，都願意迅速解決。但有一點，中國人非常重「面子」，日本人對於「面目問題」也是重視的，雙方若就這一點來爭持，那便永遠弄不清了。因爲如此，兩國當局者，都有顧慮中日國交的將來，而任勞任怨，以從速進行問題解決的必要。換句話說：便是冷靜的考慮，就大局的見地，即使遇着多少非難，也忍受着，以期事件的早日完結才好。

互讓精神的必要

不過是，兩國各有內部的情形：像國論的關係，或是議會的關係，和其他種種；中國方面也是同樣有着種種內情的。各方面要路的意見，假使不在相當程度內加以斟酌，便不能夠圓滿。所以兩國當局要互相諒察對方的內情，以互讓精神進行一切。不僅成都事件應如此，一切中日關係的調整，都應該本着互讓精神，調節各自的內情，儘量使雙方都得着滿足。中日都立國於東洋，拾小異而趨大同，兩國間接的交涉，始容易有所成就。彼此間不要以爲是外交談判，就算是東洋同志，聚首一堂，爲兩國爲東洋和平而工作，以解決一切；這才是最要緊的態度。不因突發的事件而予兩國邦交以障礙，是我所不勝盼望的。

中國的將來如何

中國的將來如何？這是個很難透視的問題。惟最近的西南事件，不久當見和平解決。所剩下的。便是華北問題了。蔣介石氏和國民政府，如能巧妙的給日本以滿足的諒解，同時又能夠保持本國的利益，而把這問題解決，則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立場，是很有幫助的。今年十一月實施憲政以後，國民黨部的勢力相當減弱，政府的立場當因之自由。應時而起的總統問題，依我觀察：蔣介石決不是馬上要做總統那樣小氣的人，讓另一名望家作總統，本人依然握着實際的軍政權力，作政府的擁護者；蔣的態度，當不外乎此。

向着統一方面走

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氏的環境，現在很好。財政方面，在日本人對之雖然有種種說法，而實際上，中國的國際匯兌，已經相當安定；經費固然很苦，然中國自二三十年以前財政就有了解，但至今日，並不會發生破產一類的事情，所以因為財政問題，說是他們怎樣危險，也不見得正確。中國的將來，不是具備相當統一的規模嗎？他們的統一，固然不像日本這樣完全，各地方依自治的形態統一於中央政府之下，自能把外交和其他一切事情，都順利的運用進行。對於他們這種傾向，不管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可是無法加以阻止。

日本應採的立場

日本對於中國的統一，便是不幫忙，也不可阻礙，這是很要緊的。成都事件，是目前的問題，為兩國計，應當從速解決。而華北問題，即是中日外交上的一個癥症——說他是癥症，雖然過火一點——不必一定說他是個癥症，如果解決得法，也能够使他成為兩國提攜的楔子。我認爲應該把華北問題，當作兩國國交調整的楔子而互相努力。

再論中日關係

有吉明作
S 節譯

前駐華大使有吉明，於九月三日起，在大阪朝日新聞發表「中日問題再檢討」一文，刻又發表一文，標題為「中國將統一乎？」刊載於十月號「日本評論」。有吉氏本其兩次在華之經驗，敘述遜清末葉至最近之中日關係。尤注重於中國民族性之剖析及中國前途之揣測，因其在華先後居住十餘年之久，觀察較深，所論自較中肯，特節譯於次：

(一) 遜清末葉的中日關係

我開始在中國居住，是明治四十二年年底到大正八年年底的十年間，那時我做上海總領事。昭和七年，我又到中國做公使，一直到本年二月，住了一年半，當初次去的時候，正是遜清末葉，清朝的統治雖已無力，但是還保持着中國的統一，當時中日間雖有種種事件，不過大概是良好的，日俄戰爭後，有說日本之戰勝俄國，是因為宣布憲政，所以清朝也派遣憲政視察員至海外，倣效日本而宣布憲政，因而，有不少的留學生來了，這就是說：當時的中日關係，正是圓滿的時代。明治四十三年日本組織觀光實業團，遊歷中國各地，大受中國各地的歡迎。明治四十四年，中國為答禮並謀中日實業提攜起見，決派遣實業團，從各部選擇各種實業家，團長為沈仲禮是上海方面有力人物，當出發時，辛亥革命勃發，遂不得不中止。

(二) 世界大戰發生時中日關係開始惡化

在革命前後，革新同盟會時代，孫文黃興來日本，其時先輩的知己朋友同志等，多援助革命運動及其建設事業。其中最有力的是犬養毅，頭山滿，學者方面有寺宅亨，副島義一，

當時的感情仍是良好的。然從世界大戰開始，日本攻擊青島，繼而提出二十一條件，中國加入協約國參戰。從此以後，中日關係有惡化的傾向。二十一條件，很使中國一般人民衝動。對段祺瑞的借款尤其是西原借款，大為南方尤其是革命黨一派所反對，孫文時時以激越的口吻反對日本的政策。

(二二) 五四運動時代中日關係

在巴黎和平會議中，顧維鈞，王正廷等要求取消二十一條，將青島直接給中國，中日關係慢慢惡化，那時，正是大正八年的晚夏，我辭了上海總領事之職。排日空氣非常濃厚，雖是十年的老友，也顧慮一身的利害而不敢送行，那時也有人秘密地來訪問，說是既不能送行，也不能開送別會請我原諒，當時的空氣，正如昭和七年上海事變後，我就任公使時相彷彿，這種事情一再遇到，真是自己的運命不好，同時在中日國交上也是很遺憾的，當本年二月辭駐華大使之職時，華北問題值當平靜，中日關係漸復常軌，南京上海兩地均誠意地為我盛大地餞行，並受當局的宴請，各方人士均來參加，使我不勝感激。

(四) 排貨運動

排日與其他排外運動相同，大概都是從排貨即「經濟抵制」(Boycott)開始的。最初的排貨運動，我記得是因為美洲排斥中國的移民，以廣東方面為中心而發生的，要之，這種排貨運動，是弱國抵抗強國的手段，中國不能作戰，實力不夠，因為人口多，外國貨用得很多，於是以不買東西來對抗，於是就成爲一種武器，在辰丸事件時，對日本很無理，其後建築安奉路線事件，二十一條件，山東問題及其他事件發生時，就開始排斥日貨了。

(五)阻止排日爲日本對華政策之一

全部阻止排貨運動及排日運動這一事實，是日本對中國政策之一部，現在還要求全部停止排日運動。滿洲事變以來的排日運動，殊令人遺憾，其中不無政府及黨部之煽動，因此，日本對於排日及排日物之運動，曾於昭和七年以來，直接或間接促政府之反省。在中國方面呢，因滿洲問題求救國聯及其他各方面無效；又覺得中日問題老是如此下去，結果如何很難預測；同時從大局着想，繼續排日運動亦屬無益；漸次覺悟，而加以取締，於是排日及排日貨運動遂告絕滅。去年二月，蔣委員長及行政院汪院長發表宣言，力說與日調整國交，中日親善提攜之必要，繼發敦睦邦交令，努力警戒對外國不使之有妨害國交的事實發生，並嚴厲取締新聞，不使之損害日本的感情，以及刺戟民心而使日本人起反感，確屬非常努力。

(六)日本應順中國民心

此外，日本對華貿易也漸次增加，「滿洲」事變以來，對華貿易額占第三位，去年，日本却變爲第二位，僅次於美國，英美都因一般不景氣，而貿易額減少的時候，日本貿易額却有增進，不能不說是一種好傾向。商會教育會及其他民間方面自發的排日運動，雖應責成政府方面嚴重取締，但中國政府也有暫時難以取締的時候，民間排日及排日貨時，原因很多。因美國的移民問題所發生的排貨運動，人民普遍地受到刺戟，一致團結，情形是相當可怕，但是這種情形是少有的，比隣爲國的日本，不待言，獲得中國的民心是必要的，所以日方不應刺戟中國民心而使之發生這種運動，日本必須「恩威並施」才對。在萬不得已時固當別論，在普通的政策上，常應該牢記這一點。

(七) 革命黨人物的變動

我在中國的時候，和各種人物會面，在上海總領事任內的十年間，我雖有時到北方去，但不長居。當時政府在北京，中國的要人都在北京，但是，現在有勢力而活動的人物，却多是住在南方的人。當時革命黨中的人物，孫文黃興不消說，現在的黃郛，張羣，唐紹儀，戴天仇，（以及已故的胡漢民伍廷芳）我都有接觸的機會，回到十四年前來看，當時認為後輩的人們，現在已居着元老或近乎元老的地位了。例如胡漢民氏，當時在孫文部下還是後輩，本人也以書生自任，不久以前去世，已經是一位元老。又如戴天仇，也是近乎元老的人物，當時為陳其美部將的蔣介石氏，以前是不出名的，現在却成爲中國的中心人物，而革命黨首領孫文，現在像神聖那樣被紀念着，人事的變遷，真不可逆料。

(八) 中國中心人物蔣介石氏

因爲各人有各人的特色，所以難以預斷，誰是最傑出的人物，誰的將來如何。照現下情形看，可以認爲最傑出的人物，還是蔣介石氏，作爲中心人物，不單是「力量」這一問題，相當的經歷也是必要的，蔣介石氏，不但在其天稟上認爲已具有中心人物的資格，而且孫文在世時及其逝世後的種種事情，他都經歷過，遇到過各種事變，擔當過各種難局，或在朝或下野，是經過不少鍛鍊的。又從其閱歷上看，人們推崇他，使他得到今日的地位，現在如要另找可與他匹敵的人物，確實有點兒爲難。

(九) 汪精衛氏和宋子文氏

還有一位傑出的人物是汪精衛氏，汪氏閱歷很深，奔走革命很久，而其識見高邁，富於

辯才，外觀雖溫柔而實具有膽力，而且愈練愈老練，因而在青年中間頗具聲望，雖沒有武力，却是文人之雄健者；與武人蔣介石相對成爲現在的雙璧。往往有人詢問，假設蔣介石氏等萬一不幸，以後將如何？各國都是這樣的，往往預料某人死後，誰爲其後繼者呢？不過，中國現在蔣汪兩氏總是出色的一對，其他雖有各種具備特長的人，可是現在能特別指出來的却祇有這兩位，被稱爲歐美派的人們之中，如宋子文，就其人才，力量及在經濟界的勢力說，似乎是很有資格。不過宋氏作爲政治家，是否能有大成，却不無疑問。

(十) 中國人重面子而且守舊

中國人第一重面子，重體面，第二是守舊，第三是愛和平的人民，天性不喜爭執。並且是富於妥協性的。就重面子這一點而言，中國人祇要不失面子，往往犧牲某種程度的實利，也做得到。關於守舊這一點，則已深入一般國民的心理。例如民國以來是採用新曆的，但是直到今日，雖如通商要埠的上海，仍保守着舊曆正月，各官廳照新曆休假，民間只附和着休假一天，到了舊曆正月，民間一班休假一週乃至一週以上的時間，依然過着舊曆正月，也是守舊的一種表現。到了國民黨統治中國時代，三民主義風靡一時，於是，放棄宗教，什麼孔子之類早置之度外。但到最近，開始修復孔廟，恢復祭孔，獎勵儒教。這實際是好事，但是一方面，却不容易使一般國民往新的方面前進了。

(十一) 中國人愛好和平富安協性

第三點，愛好和平，不喜爭執，並富於妥協性。舉一個最近的例子：譬如西南事件，雖說要戰爭，仍沒有戰，還是抽回手去，雙方妥協解決。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曾經互相開

戰，但是戰爭都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發生。在許多場合，總是盡可能地和平交涉的。中國一般國民雖都是如此。不單政府方面是這樣。人民方面也不事爭鬥。也有人說中國人易變而無信用，但我並不以為是這樣的。原來中國人在商業交易上非常守信用，許多國家都認為中國人作商人是很好。我認為多少近乎事實，中國人能忍耐也是國民性之一，我認為中國人在某種程度以內還是可以信賴的國民。

(十二) 外患煎迫促進了中國統一

中國已可看到統一的傾向，我這次感到中國的變化的是通信，交通的發達，無線電報發達很快，鐵道也有顯著的進步，各地興築的公路，尤其多，至於航空，的確很發達，此種交通上的發達，使廣大的中國，各地距離漸漸縮短。自從「滿洲」定了「國家」，東四省已分離；新疆方面，蘇聯勢力深入，事實上在統轄之外，西藏方面，英國勢力，也很深。受到這種外國的壓迫，國家不得不堅固，這就是說，內外情勢相迫，而促進了統一的傾向。

(十三) 國民黨得勢的原因

第二點感到的是國民黨勢力的增進，如第一次革命時代，如同盟會革新時代，集新舊小政派而構成國民黨，大家都知道勢力尚小。袁世凱稍加壓迫，就四分五裂，但在今日，國民黨勢力普遍全中國，形成了現在的政府。國民黨之所以達到今日的地步，是有着如次的一個主要原因的：原來在軍閥和政派作各種爭執之際，單爭權力，並沒有什麼率領國民的指導精神。袁世凱死後也是如此，在安福派，奉天派，直隸派等從事毫無目標的爭執的時候，國民黨至少已經在一定的方針之下，獲得了民心，它是有着施行黨治政治的一貫的指導精神的。

，這是國民黨獲得現在勢力的主要原因。

(十四) 中國國民已有相當政治能力

另一方面，國民黨普及政治教育於民間，也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當我不在中國的時候，中國人民已經受到很好的政治教育了，現在廢止訓政進入憲政的時期已近。在本年十一月，舉行國民大會，宣布憲法，就入憲政時期了。並且將選舉總統。可是能實施真正的立憲政治與否，頗有疑問，我們也許能看到一種變態的獨裁政治罷。較之於第一次革命時，國民的政治能力，已得發達，而且至少有着蔣介石這一中心人物作援助，所以，祇要現在的情形繼續下去，會有某種統一政治出現的，然而如以此與日本那種統一比較時，頗有不同之處。要中央一呼，到處服從是頗為不易，但是可以出現一種聯邦制度。說到統一，定義上似乎是打成一片，但照字面來解釋的那種統一，前途大概還遠。據我觀察，現在正向統一的路線進行中。

(十五) 改善國民生活和國民經濟

我認為現在的中國，在逐漸進步中，將來是決不用悲觀的，如前面所說，現在已經多少有統一的傾向。而蔣介石發起新生活運動，正在實行中，這是以改善國民生活為信條的，各地相當熱心的實施着，並且另一方又發起了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目的是改善國民經濟，也正努力進行中。這種運動在我看來，是相當真實的。

(十六) 幣制改革有着相當效果

一面作這種國民革新運動，同時，另一方面，在財政及其他方面也有所改革，關於最近

的幣制改革，至少在今日以前并不會有什麼大破綻，有着相當的效果，經濟界也保持安定。照這種步調進行，那末十一月頒布憲法，同時平安地進行總統選舉，進入憲政時期，大概國情是可以從此安定起來的。

(十七) 中日關係的重心在華北

但是成爲問題的是和日本的關係。而中日關係除現在的成都事件以外，主要的是華北問題。中國方面如果遠瞻將來，力圖解決華北問題，以及調整中日關係，那末中國前途是頗可樂觀的，如能有某種程度的統一，而且謀中日關係之調節，則很容易得到英美及其他國家經濟上的援助，對於經濟及財政的改革，亦有裨益。這一點是我所衷心希望的。

日應調整遠東外交

齋藤隆夫作
K 節譯

自遠東風雲爆發以來，日本在遠東政局中竭力進行其東亞門羅主義，在國際方面，顯已陷於孤立，日本人士對本國的孤立政策，大都表示就慮，因而多有主張對蘇對華實行外交調整，務使日本大陸政策的進度不致過於離開了日本的國防實力。本文載中央公論十月號。以財政經濟的觀點評述大陸政策，謂日本的國防實力，保守「滿洲」則有餘，作更进一步的進取則不足，特譯述於後。

(一) 滿洲事件以來日本內外政治發生大變動

近時日本的內外政治，以「滿洲」事件為契機而有一大轉換。「滿洲」事件在我國（日本）是歷史上的大事件，所以，以此次事件為原因，而在內外政治上發生一大變化，是絲毫不足驚訝的，外自退出國際聯盟以至國防情勢的變化，內自國防計劃的調整以至財政，經濟，國民生活及其他各方面所發生的影響，都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二) 「滿洲」事件費五年來達十一億圓

試從財政上的見地加以檢討，不消說，今日的「滿洲」是獨大國。除日本以外，世界各國在形式上承認其獨立與否。對於滿洲為「獨立國」這一事實，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然而從另一面來看，「滿洲國」雖為「獨立國」，可是建國以來，為時不久。國力尙未充實，不會具備單獨維持國內治安，防禦外敵的實力。於是，日本根據昔日訂定的日「滿」議定書，派遣帝國軍隊至「滿洲」，以坦負維持治安，防禦國家之重任，照實際情勢來看，此種方針，

此後將長期繼續不予變動。因此，發生了財政問題：這就是說，派遣軍隊必須有國家經費，而且需要相當鉅額國費，從「滿洲」事變發生的昭和六年年底至本年的六年間，國庫支出及將支出的滿洲事件費，共達十一萬萬餘圓。而且此後幾十年其數目將達幾十萬萬，誰也不能預定。齋藤內閣的時候，陸軍大臣荒木雖聲明「滿洲」事件費一兩年後大可減少，但是此種聲明，徵之於以後的事實，完全相反，事件費非但不減少，而且反而時時增加。財政上的問題，決不能忘記的。

(三) 日本不惜任何犧牲擁護「滿洲」的獨立

其次是國防計劃的調整，以「滿洲」事變為起因，而日本退出國聯，國際情勢大變，與其說是變化，無寧說是惡化，看遍今日全世界各國，真正能為日本友邦，於國家事變時，在精神上及物質上共同動作的國家一個也沒有，非但沒有，而且有機會時，還預備對我國（日本）加以打擊，但是，任憑世界各國怎樣想，日本總是有日本的主張。日本始終不惜以任何犧牲來擁護「滿洲」的獨立，開發「滿洲」的資源，以圖兩國之共存共榮，並保持東亞的和平，因為這是我國（日本）確立不變的方針，所以是不得不如此的。

(四) 發行赤字公債擴充軍備

這里就有了問題，那就是國防計劃的調整，所謂國防計劃的調整，就是擴充軍備，擴充軍備必然要鉅額的國家經費，今日國家經濟的半數，充為軍費。但是祇要財源不缺乏，縱令是需要怎樣鉅額的軍費，也不用擔心，可是因為沒有財源，就不得不用借款來充用。於是發行赤字公債。最近數年間，因為每年繼續發行七八萬萬元的公債，所以公債增加了。數年前

